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dan7315@163.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邓小平重视党校建设

——学习《邓小平文选》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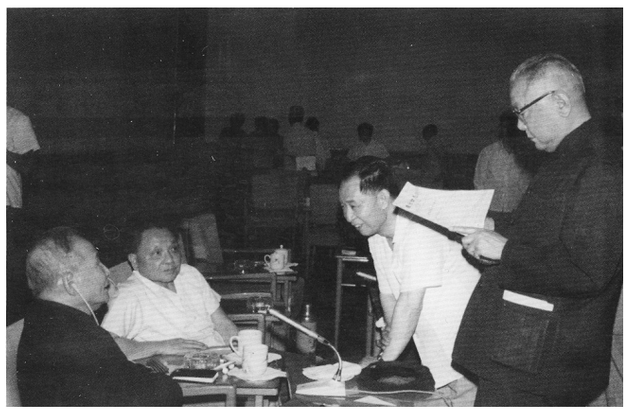
□周大仁

邓小平同志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一样，亲自到党校讲课作报告，把党校作为培养教育干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收入《邓小平文选》的文章中就有两篇是他在党校的重要讲话。一篇是《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是小平同志1943年11月在北方局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动员报告。他根据我们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精辟地论述了“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方法”，强调整风学习要联系干部自身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决不能敷衍了事。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大张旗鼓地抓各项工作的整顿，专门抽时间到中央党校举办的第四期中央读书班给学员讲话。在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这篇讲话中，他强调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和意义；批判了垒山头、闹派性、破坏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以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方针。这个讲话为尔后拨乱反正，结束“文革”动乱；为正本清源，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正确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进一步明确肯定了执政党党校的地位、结构和作用

关于党校的地位，小平同志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引证了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其中专门提到了党校。决定说：“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这说明，中央一贯把党校视为党的领导机关，一贯把党校看作与部、委、办、室单位平行的同级重要部门；说明党校的重要地位是经毛泽东、邓小平等亲自提议并经党中央集体决定的，应该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全国党校的结构和网络。1954年7月，邓小平同志指示，为了把全部党员干部在若干年内轮流培训一次，必须把各级党校作适当调整，建立高、中、初三级党校体系并相应制定轮训计划。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精神，1954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校工作汇报会，研究讨论了建立全国党校网络和轮训全党干部的问题。会后，中央发布了《关于轮训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初步形成了上下衔接，分工明确的高、中、初三级党校教育网络体系，使得党的高、中、初三级干部都能到相应级别的党校接受培训和轮训，有效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胡耀邦在一起阅读《理论动态》文章

小平同志还认为，培训干部的学校不仅要起到教育干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起到选拔推荐干部的作用。他在《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一文中对干部学校提出了三个要求，其中第一个要求就是“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小平同志的这些话虽然是对军队院校说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完全适合于党校。从一定意义上讲，党校更应该起集体政治部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1990年第15号文件已经明确规定：“干部进党校学习，取得党校学历，是干部学历的一种标志，是年轻干部提升到新岗位任职的必备条件”。中央1994年第5号文件又一次明确：“要坚持把参加党校主体班次学习的学历，作为干部被推荐、任命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必备条件之一”。

具体提出了如何办党校的方针和方法

第一，关于党校的学制。小平同志认为，党校的学制要长短结合，经常办，不断线。他说：“党校，带有经常的性质，学习时间长一点。党校还要培养理论干部，要求学员系统地读些书。轮训，则时间很短。或者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看来，党校不经常办会受到损失”。“轮训……不一定搞一个半月”，可以“用十天半月或者一个星期，脱离工作，去议论一番。也可以读一读书，或者在一个时期集中议论一个什么问题。”

第二，关于党校的学风。小平同志认为，要培养好的学风，“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他说，科学“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为了实事求是，就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就要“提倡学术交流”，反对“互相封锁”。小平同志还指出，党校轮训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总起来说，就是要贯彻“毛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

第三，关于党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所作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号召“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什么呢？“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里讲的干部学习内容，也应该是党校的教学内容。怎么学呢？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而不要搞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学马列要精”，就是要求必须突破那种冗长繁细的老一套灌输，在精读原著上多下功夫，学一些基本的东西，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管用”，就是要求把理论从书斋中从课堂上解放出来，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之“的”，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党校教育要以马列主义为主课，兼学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管理理论、科学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贯彻精选精读、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关心和重视党校建设

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岁月里，邓小平同志亲自到北方局党校作整风动员报告，是因为“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1975年，在治理整顿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到中央党校举办的读书班去讲话，是为了运用党校这个马列主义讲坛，宣传毛泽东思想，揭露“四人帮”反对马列主义、制造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卑劣行为。1978年，邓小平同志热情支持和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因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最为推崇，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就是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十年“文革”的迫害，耽误了老干部的宝贵年华。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如何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合格接班人？小平同志认为，基本途径在于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靠自学、靠实践锻炼；另一方面靠办学校来解决。他赞成徐向前同志的意见，“要多办学校”，“宁肯少几个机关人员，也要把学校办好，让多一点人进学校”。他指出，对于发现的优秀人才，要“加以培养，进进党校”，使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在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关怀重视下，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不断得到加强，各级党校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领导人才。

（作者系湖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为官须破除不良心态

□汪玉明

自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面对全党上下针对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凌厉整治动作，部分领导干部发出了“为官不易”的感叹，更有人产生了“为官不为”的念头，这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习总书记在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身在其位，则谋其政。各级领导干部既是人民公仆，也是所在单位、地区谋划建设的主心骨，承载着党和人民的信赖，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坚决消除“为官不为”的错误念头，必须破除“无过则功”“行多必失”“功过勿论”的不良心态。

破除“无过则功”心态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为官不为”现象，群众对此做了形象描述，“要发文件，等待实践；要去实践，等待文件；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对于这种不作为干部，更有人称之为“山寨式”干部。为官不作为，究其根源，就在于官本位思想作祟。一些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有进步，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组织给他一定的职务职位，就是对他奋斗的一种褒奖，只要自己不犯错误，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职务带来的安逸和实惠，“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抱着一种“无过便是功”的心态对待工作，这是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

当然，“无过则功”心态的出现，既有领导干部自身存在官本位思想的原因，也与各级组织监管不力、监管不周有着重要关系。为官“当作为”，这本应是党和人民对各级干部的最基本要求，但具体到实践中，面对部分领导干部的“不作为”现象，来自监管部门的监管弱化，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缺位，造成了领导干部“不作为”成为一种隐性的腐败，极端不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作为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领导干部，必须破除“无过则功”的消极心理，切实认清“官位”就意味着“责任”，“当官”就必须造福人民，要从思想上真正明白自己的公仆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要关心群众疾苦，而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舒适度。习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

破除“行多必失”心态

当前，全党上下大力提倡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大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打虎”“拍苍蝇”力度很大，不少腐败分子纷纷落马，对于广大领导干部产生了猛击一掌、大喝一声的警示效果，增强了大家拒腐防变的思想意识，受到全党全社会高度赞赏。但也要看到，部分领导干部对党下大力气反腐败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于这种警示意义的认识发生偏差，将警示效果异化为畏难情绪，将“少作为”当作“少犯错”的挡箭牌，将“行多必失”视为明哲保身之道，这实际上也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体现。

“行多必失”心态的出现，折射出的是部分领导干部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的心理。从工作角度而言，要谋划推动工作，就有存在失误偏差的可能性，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用严谨的态度将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既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任的体现，也符合工作规律。如果仅仅为实现“零失误”而不敢有任何作为，则谋划推动工作就成为一句空话。这种机械的“零失误”理论一旦扩散开来，领导干部都不敢作为，都奉行明哲保身之道，实则不仅贻误党和人民的奋斗大业，而且会害了领导干部个人。

破除“功过勿论”心态

杜绝“乱作为”，做到“善作为”，就必须破除“功过勿论”心态。“功过勿论”心态折射的是功利主义思想意识，为求私利不择手段，为求政绩不计后果，将公权力作为谋取利益、赚取声誉的工具，抱着“成功不计得失、他人与我何干”的想法，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胡乱作为，企图侥幸过关，其结果既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

近年来，“乱作为”现象比较突出，深受人民群众诟病。究其背后动机，无外乎两种。一是用权不公，部分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千方百计发挥其“寻租”作用，或通过为他人谋取私利而收受各种贿赂，或对于自身及亲友从事社会活动额外照顾，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为特定对象考虑较多，对公众利益考虑较少，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从而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也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二是用权不善，部分领导干部掌握一定权力后，主观上想有所作为，也敢于作为，力图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对于问题的研究不深、不透，对于工作中的困难估计不足，盲目乐观，武断决策，导致政策脱离实际，遇到群众抵制时又自我辩护、强力推动，结果导致决策理想化、推行强制化、效果空泛化，造成民怨沸腾，极易引起群众与党和政府的情绪对立，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如果说为官“当作为”“敢作为”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善作为”就对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领导干部，应当将群众举过头顶，甘当群众学生，对权力有敬畏之心，秉公用权、善作善成。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难在限己

□宋志坚

城市车满为患，治堵已成新课题。限号还是限牌，则是难以回避的抉择。二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合理而且有效，但多数城市都选择了后者。有人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限号……影响的是开车一族的利益，会受到这个阶层强大的阻力，决策者多属于这个阶层。坐车的屁股决定着限车的脑袋。而限牌则不一样，限制的是无车人买车的权利”。也就是说，决定限号还是限牌的，既非是否合理，亦非是否有效，而是对决策者是否有利，其实也是“限己”还是“限人”的抉择。

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大可举一反三。房价一路飙升，长达十年之久。中央政府自2003年起开始调控，今年刚有回落的势头，就有地方政府托盘救市的信息不断传来，与先前有气无力的“调控”形成鲜明的对比。且不说“土地财政”中有着地方政府的政绩与利益，使有关决策者不忍割舍，即从有房无房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心理天平会向哪一边倾斜——无房者渴望房价下跌回归理性，他们不愿当一辈子房奴；有房的人却是别有一番心绪，那些以多套房来做“摇钱树”的，会甘心房价下跌吗？

领导干部“财产公开”说了多年，如今有的地方开始“公开”了，但不公开“主要领导干部”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是“×管干部”。那么，非“主要领导干部”没有意见吗？出于“下级服从上级”，他们不敢说；有的地方试着“公开”，先公开准备提拔的干部，理由也很充分，说是“以便减少阻力”。那么，等待提拔的干部没有看法吗？其实，不管是哪一个“×”管的干部，你主动把自己的财产公开了，“×”也不便说你什么，“×管干部”显然只是一种托词；至于“以便减少阻力”，则分明已将“老的”归入“阻力”去了，但“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就是不肯松口。

与此相反的情形也有，例如，从1980年到2011年的31年中，“工资、薪金所得”的税收免征额先后四次调整，从800元提高到3500元，而“劳务报酬所得”的税收免征额依然保持在800元。为此，两三年前，先有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方宇清先生提出关于“提高劳务所得税起征点”的建议，后有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先生在“两会”期间为“劳务税”建言，然而，无论是建议还是建言，犹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与“限号还是限牌”一样，诸如此类的决策或抉择，也都有“限人”还是“限己”的问题。而且，“限己”总比“限人”难。尽管在很多时候很多问题上，“限己”往往比“限人”合理而且有效，所谓“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却很少有人愿意选择“限己”——限制自己的权力，限制自己的利益，限制自己的欲望。“限人”时“侃侃如也”，大道理一套接着一套，“限己”时“与与如也”，半抱琵琶，总是有点羞羞答答；“限人”时会用铁心肠铁手腕，“限己”时却怎么也“铁”不起来。

都说“屁股决定脑袋”，可见“限己”之难。倘若难而能为之的，就显得格外可贵。

（摘自江苏省委党校《唯实》）

党校文摘

党校的一抹橄榄绿

□和 昆

有这样一群哨兵，他们担负了一批又一批外国元首政要来中央党校参观访问、学习培训、发表演讲时的警卫任务，用威武的警姿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有这样一群哨兵，他们警惕地保卫着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发源地、中国红色资源的思想库，用火热的青春为中央党校构筑起一道道橄榄绿的屏障，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万千国家栋梁来党校研讨培训的安全守护神。这就是被党校广大教职员工亲切地称呼为“党校一抹橄榄绿风景线”的武警北京总队三师十一支队七中队。1985年第一批武装警卫力量进驻党校，目前是武警部队担负的唯一的党校警卫勤务。

忠诚事业。哨位需要忠诚，哨位考验忠诚，哨位实践忠诚。谈起战士们警卫的党校，中队官兵无不为之骄傲自豪，这种骄傲自豪来源于官兵内心深处对党校倾注的浓厚感情、饱含的政治热情。一茬又一茬的执勤官兵把驻地党校当故乡，把党校人民当亲人，甘愿在党校这片热土上挥洒青春的汗水，把珍贵的韶光年华献给警卫党校这一崇高的事业，用自己短暂的军旅青春铸就对党的忠诚，坚决实现党校警卫目标的绝对安全和万无一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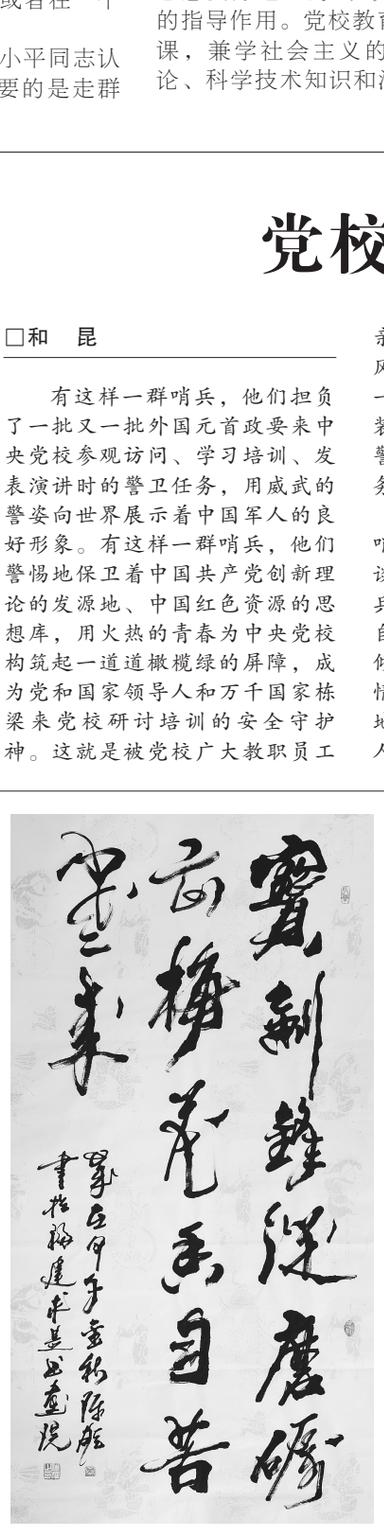
牢记嘱托。2011年1月14日，对于中队官兵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亲临警卫中队视察慰问，勉励官兵要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扎实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这对于党校警卫中队的官兵来说既是莫大的鼓舞又是激励鞭策，他们将习主席的期望重托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倾注于警卫事业中。2012年的夏天，一场罕见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党校12号楼南200米处，因积水过多，行人无法通过，车辆无法通行，中队紧急出动20人，清除了障碍。在常年的执勤中，警卫中队着眼担负党校安全警卫任务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岗位，特殊的任务，制订出了四条执勤要求：“风吹不眨眼，天热不擦汗，虫咬不动手，熟人不交谈”，有效地确保了任务的完成。

继承传统。武警北京总队三师十一支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张思德生前所在的部队，有着光荣历史，诞生在井冈摇篮，战斗在中央苏区。无论时代如何变革，这支部队都保持着红色的基因，传承着红军的光荣传统，践行着“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六十多年来，我们支队始终坚持用张思德精神凝魂铸志，涌现出一大批“张思德式”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作为这种优良传统的传承者，他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一流的工作标准，争创一流的工作业绩，使之真正转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崇高的人生追求。

武警部队驻守一方、保一方平安。自担负党校警卫任务之日起，警卫中队就与党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多年来，在警民共建的实践中、在日日夜夜的相处中、在共保安全的协作中，这支部队也与党校领导、教职员工及家属群众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警卫中队将继续牢固树立“驻党校、爱党校”的思想观念，倾注浓厚感情，饱含政治热情，在党校执勤岗位上，充分展示首都武警忠诚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精锐之师的良好形象，为党校这片文兴德昌，厚德载物的育林之园奉献青春。

（作者系武警北京总队三师十一支队七中队指导员）

校园生活


书法 陈雄（福建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师生才艺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